

坎珂的历程

近代学习西方八十年

吴廷桢 赵颂尧 著

KANKE DE LICHENG



K250.7
3

87671

坎坷的历程

——近代学习西方八十年

吴廷桢 赵颂尧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7.20-20

(京)新登字 030 号

责任编辑：曾梅筠

责任校对：王桂琴

封面设计：谭国民

版式设计：张汉林

坎坷的历程

——近代学习西方八十年

吴廷植 赵颂尧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大兴新魏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625印张 264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00册

ISBN 7-5004-1143-X/K·168 定价：9.20元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清朝的闭关锁国	(9)
一、闭关政策的主要措施	(10)
二、闭关政策的社会历史根源	(16)
三、闭关政策的严重后果	(21)
第二章 睁开眼睛看世界——近代学习西方的发端	(27)
一、鸦片战争惊醒了有识之士	(27)
二、一批探索“夷情”著作的问世	(29)
三、先哲们看到了什么	(38)
四、学习西方的发端及其特点	(46)
五、顽固派的奇谈怪论——近代中西学之争的萌芽	(48)
第三章 皇上帝与太平天国	(53)
一、洪秀全的创举	(53)
二、《天朝田亩制度》——农民的理想国	(69)
三、《资政新篇》——理想国的新构想	(71)
四、深刻的启迪	(81)
第四章 中体西用——近代学习西方的第一阶段	(84)
一、洋务派及其思想共性	(84)
二、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90)
三、洋务运动	(95)
四、师夷与反师夷的辩论——近代第一个回合的 中西学之争	(110)
第五章 君主立宪——近代学习西方的第二阶段(上)	(121)

079163

一、洋务阵营的思想分化	(121)
二、君主立宪——中体西用的否定和发展	(133)
三、“西学中源”说	(155)
四、戊戌思潮余论	(161)
五、《翼教丛编》——近代中西学之争的第二个回合	(164)
第六章 民主共和——近代学习西方的第二阶段(下)	(169)
一、民主共和思潮的兴起及其高涨	(169)
二、民主共和思潮总纲	(173)
三、民主共和思潮分论	(187)
四、立宪与共和之论争	(247)
第七章 新文化运动——近代学习西方的第三阶段	(253)
一、政治现实与文化反思	(253)
二、中西文化之论战及其实质	(258)
三、意义和问题	(278)
第八章 以俄为师——近代学习西方的历史转折	(281)
一、中国向何处去	(281)
二、中西文化论战的继续和发展	(286)
三、西方模式的新抉择	(296)
四、三次论战及其影响	(314)
结束语 近代学习西方八十年的基本结论	(323)
附录：经典著作、专著：论文征引参阅举要	(333)

序 言

学习西方，是近代中国对欧美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猛烈冲击的积极反应，是面临严峻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形势下提出的时代课题。目的在于寻求救国真理，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文化，解决救亡图存和独立富强的问题。

何谓文化，众说纷纭，学者曾提出过二百多个定义^①。通常认为从广义来说，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文化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文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不仅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而且由于它本身固有的吸收性与融合性，因而能够不断补充、丰富和流传。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人类和人类文化经常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形成了许多性质各异、彼此独立的文化区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战胜自然能力的提高，文化区域之间逐渐克服自然与人为的障碍，从而出现了文化联系与交流。从宏观上看，随着人类在古代征服陆地、近代征服海洋和现代征服空间，各文化区域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发生了三次巨大的飞跃；与此同时，生产方式和交换关系的变化发展，民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编《中国文化辞典》1987年版称：“当今世界的学者专家们，曾对‘文化’一词下了二百多个定义”。

族的大迁移、大征服、大殖民运动，以及由这种情况带来的政治经济影响，都直接推进或阻碍各区域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中国是个文化古国，悠久灿烂的中国文化，不但哺育着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中华民族，而且也为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创造。在历史进入近代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外交往非常频繁，促进了相互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并在文化方面出现过几次较大的接触和融合。尽管当时的中外贸易或物质文化交流，往往采取“赏赐”和“朝贡”的名义，中国统治者涉外关系的基本出发点，是“怀柔远人”和“宣扬国威”，强化封建主义统治。但是，这种频繁的中外交往，客观上推动了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降至明清之交，中国封建主义进入末世，国势日微，统治者开始采用与世隔绝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存在。尤其是清代，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使古老而文明的中华民族逐渐衰落下来，不但不能迅速跨入近代，而且到了19世纪初，同先进国家相比较，已经远远地落在后面了。

二

1840年的鸦片战争惊醒了中华民族，有识之士发出了“师夷”的呼声。

客观的历史潮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9世纪的国内因素和国外压力，要求中国从封闭状态中解放出来，迈开步子，走向世界。

中国近代商品经济的幼苗尽管很弱小，生长也很艰难，但中国毕竟出现了新的经济成分和新的时代要求，这些新的社会因素，是与近代世界潮流相一致的，因而成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能与一切外来的足以动摇中国封建统治观念的西方近代化思想互相

结合的媒介。尤其是鸦片战争前后社会危机的日趋严重，封建专制统治的衰败，孕育着经世致用的新学风。当一批倡导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们把眼睛盯向外部世界时，对内革新和对外“师夷”必然结合起来。

在国际上，西方资产阶级已经活跃在东方，正在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马克思曾经指出，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不仅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①。这就是说，这两次革命是反映世界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要求；革命的胜利，标志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胜利，开辟了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和资产阶级统治的新时代。此后，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封建主义走向没落和瓦解。英法革命后的一百多年间，“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②。鸦片战争前夕，中国面临的正是这样的格局。

基于上述的国内外形势，19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新的动向，少数封建知识分子锐敏地触及了时代的脉搏，预感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威胁，提出了“探阅”外情和“以夷伐夷”的主张。叶钟进在《英吉利国夷情记略》一文中，十分重视澳门出版的各种报刊，认为“苟当事留意探阅，亦可观各国之情形，皆边防所不可忽也”^③。明确地把“探阅”外情和“边防”即反侵略结合起来。谢清高在《海录》一书中指出，英吉利“急功

①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第32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②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第254—255页。

③ 裁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11帙。上海著易堂印行，光绪版。

尚利，以海舶商贾为生涯，海中有利之区，咸欲争之，贸易者遍海内”^①。何大庚在《英夷说》中也指出，“英吉利者，昔以其国在西北数万里外，距粤海极远，似非中国切肤之患。今则駸駸而南，凡南洋濒海各国，……皆为其所胁服而供其赋税，其势日南，其心日侈，岂有厌足之日哉？”^②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肖令裕的高瞻远瞩，他说：“西南洋之印度及南洋濒海诸市埠与南海中岛屿，向为西洋各国所据者，英夷皆以兵争之而分其利”^③，并从中发现英国与美、法、葡之间的“夙与仇讎”，主张中国在反侵略斗争中利用矛盾，“使相攻击，以夷伐夷，正可抚为我用”^④。这种“探阅”外情和“以夷伐夷”的思想，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探阅”外情和“以夷伐夷”思想的出现，是鸦片战争前思想界的妄自尊大转到开眼看世界的信息。从叶钟进和肖令裕的“探阅”外情、“以夷伐夷”，到林则徐和魏源的“采西学、译西书”，“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正是开眼看世界的逻辑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开端。

三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学习资本主义西方的第一阶段。

这个阶段以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口号为起点，以90年代甲午战争失败和洋务运动破产而告终，是“从器物上感觉不

① 载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11帙。

② 同上。

③ 肖令裕《英吉利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11帙。

④ 肖令裕《粤东市舶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9帙。

足”^①而向西方学习的阶段。中心内容是“提倡西洋制械练兵之术”^②。师夷的始倡者是地主阶级开明派，师夷的实践者是洋务派。“中体西用”论是这个阶段学习西方的宗旨。洋务派的成败如何，评论不一，但他们毕竟把“师夷”主张，从思想认识推到了实践，迈开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

在这个阶段中，由于国内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严重，农民出身的洪秀全、洪仁玕也担负了时代赋予的学习西方的使命，而且做出了与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迥然不同的创举，吸收和利用了上帝帝的权威以及原始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发动、领导农民战争，决心用暴力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清政府，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要建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国；继而提出《资政新篇》，规划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宏伟方案。只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没有完成改造中国的艰巨任务，成为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壮丽插曲。

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第二阶段，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而向西方学习的阶段^③。要求“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④。

这个阶段学习西方的任务是由资产阶级承担的。其中又分为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前者主张君主立宪，萌芽于郑观应、王韬等人，康有为、梁启超则为集大成者；后者主张民主共和，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为代表人物。这两派人物的思想雏形，大约发源于19世纪80年代，百日维新和辛亥革命是两种思潮发展的

①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8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② 《吾人最后之觉悟》，三联书店编辑《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06页。三联书店，1984年。

③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梁启超选集》，第833页。

④ 《吾人最后之觉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07页。

最高峰。维新运动最终遭到顽固派的血腥镇压，戊戌六君子用自己的头颅作为维新事业祭；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史的转折点。但是，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就被袁世凯等人夺走了，中华民国有名无实，中国人民仍然处在苦难之中。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第三阶段，是“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①而向西方学习的阶段。主要议题是对辛亥革命后政治现实的文化反思，认为“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深刻感到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文化机制同社会制度改革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从而引发了要求中华民族的“伦理觉悟”，认定“伦理觉悟”才是“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②。1914年5月《甲寅》月刊在东京问世。提出寻求“政治根本之精神”的新课题，为新文化运动做了某种准备。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陈独秀、李大钊等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批判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和封建迷信，矛头直捣孔家店，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运动，把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破旧立新的理论与实践，引到了文化的最深层，触及了中西不同类型文化的质的规定性。到此为止，近代中国在向资本主义西方学习的时代课题上，从浅入深，由表及里，走完了一轮全过程。

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伟大历史性转折。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学习西方的迷梦。多次奋斗，都未能实现国强民富的目的。通过鸦片战争以来半个多世纪的积

①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梁启超选集》，第834页。

② 《吾人最后之觉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08—109页。

累、比较和探索，到了五四时期，思想定势和群体意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把视线和注意力转移到了俄国，决定抛弃资本主义，向往并接受社会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奉俄为师，坚持走俄国人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此，中国社会的现实和前景为之焕然一新。这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历史选择，最终找到了一条走向独立富强的必由之路。

四

当今的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并正在改革开放的富强之路上奔驰。改革开放与近代八十年的学习西方和革新中国，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所谓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即根据社会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调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所谓开放，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立脚点，积极利用外资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有成效地扩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二者根本的任务，是加速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但是，历史和现实是互相联结的。现在和未来，都是过去的继续和延伸。现实的一切，无不萌芽于既往，无不和既往有不解之缘。“观今宜鉴古”。对已经过去的事情进行研究和总结，正是为了正确地把握现在，面向未来。何况近代学习西方和当前的改革开放，不但在某些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共同点或相似点，而且它距离今天，也仅仅只有几十年、百把年的时间，同现实社会生活与实践息息相关，尤其是五四运动前的学习西方，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无不以失败而告终，然而它又是在一次次的失败中不断发展和前进的。前一次失败，在认识上提高了

人们的理性，提醒了人们对于学习西方的要求和革新社会的方式方法与目标，必须进行合理的更深层次的调整。从而一次次失败过程的终结，又成为中国社会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个里程碑。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是历史留给后人的可贵的精神财富，在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应该从中吸取有益的历史借鉴。这就是我们要对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八十年进行回顾的目的所在。

书稿是在原来给西北师大历史系研究生和甘肃省委党校党政干部研究班讲授专题课教材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在讲义编写和修订过程中，广泛吸收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未及一一注明，西北师大图书馆提供了大量资料；在出版过程中，得到西北师大和党校各级领导的积极支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曾梅筠、冯广裕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谨此一并深致谢忱。

赵颂尧同志撰写书稿的第一、三、四、五章，吴廷桢同志撰写序言、第二、六、七、八章和结束语，并校订全书。由于理论和业务水平的限制，错误和不妥之处是难免的，殷切盼望得到专家和读者的指教。

第一章 清朝的闭关锁国

古代中国同国外有着广泛的交往，这种交往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开拓，即“怀柔远人”和“宣扬国威”，强化封建主义统治。所以每当国家强盛，政府和人民的矛盾相对缓和的时候，统治者能够突破自然经济的封闭性，采取开放的态度，对外交往主动而频繁，客观上却适应了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促进了对应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与繁荣。中国也以广阔的胸怀，拥抱来自印度、阿拉伯及地中海沿岸等地的物质精神创造，为自己的传统经济文化摄取了新的营养。特别是汉唐时期印度佛教的传播，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外国文化的大输入。经过长达几百年的吸收、汇合和消化，到了宋代，儒、道、佛交融，理学勃兴，儒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哲学体系。

明清之交，欧美资本主义兴起，西方资产阶级四处钻营，牟取暴利；与此相反，中国封建主义进入末世，国势日益衰微，统治者开始采用与世隔绝的办法，以保卫自己的存在。尤其是清代，实行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还“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①，终于受到了愚昧、落后和挨打的历史惩罚。

^①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二，第26页。

一、闭关政策的主要措施

17世纪40年代，清朝统治中国之后，由于政治上思想上等方面的原因，采取了与世隔绝的闭关锁国政策，把自己禁锢在闭目塞听的小天地里。清朝的闭关政策是一种封建主义的国家，包括对内对外两方面的内容。对内是政策的主要方面。对外主要表现为通商口岸的划定和对外贸外商的管理。

限制通商口岸。清朝初年由于南方沿海抗清势力的存在，清统治者绝对禁海，断绝中外联系，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台湾抗清势力被镇压，清朝感到统治已经稳定，才宣布取消以前关于禁海的某些规定，指定广东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后改定海)、江南云台山四处为外商来华的通商口岸。但是，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下令通商口岸只限广州一口，封闭其余三口，据《清实录》、《东华录》等有关资料记载，乾隆所以要收口闭关，一是担心洋人日趋宁波，扩大了中外接触面，将影响“民风士俗”，即影响封建礼教、等级制度、道德规范等，二是担心洋人深入内地，“积久留居内地者日众”，会支持、滋长东南沿海人民久已存在的反清情绪，内外结合，产生可怕的后果，所以要防微杜渐。此外，洋人日渐北趋，也有违背于中外交往远离京畿的传统。因而下令洋船“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须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①。

设立公行。外商在华贸易和其他事务都必须通过清政府所特许的“公行商人”来进行。所谓“公行商人”，是明代废除“市舶提举”后逐渐形成的一种制度。在明代以前，对外贸易都是通过政府特设的市舶司来经营的。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由官吏直接与外国交易的市舶司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因而改由

^①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一，中华书局1962年，第181页。

政府指定几个商人，设立“牙行”，从事进出口贸易，称为“官牙”或“洋行”。到了18世纪初，为避免相互竞争，洋行的商人组成垄断性质的公行，通称十三行。这种公行制度在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清朝的官员和海关人员都不和外商直接接触，外商的大班、二班原则上也不得会见政府官员，一切事务都通过公行居间经办。公行的主要任务是划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承销外商进口的货物；代购外商出口的货物；经手外商进出口货物的海关税，照料外商生活并监督其行动，为清政府具体办理一切对外商的外交事宜；向外商转达清政府的谕令、公文；为外商传递致清政府的禀帖、意见。公行具有商务与外交的双重职能。前一种职能是传统的，后一种职能则为历史上所罕见，这是清朝统治者以天朝自居的封建官僚制度的产物。

限制外商在华活动。清朝在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先后颁布过《防夷五事》（乾隆二十四年）、《民夷交易章程》（嘉庆十四年）、《防范夷人章程》（道光十一、十五年）等法令，对外商活动作了种种规定。如规定外商不得在广州过冬。通常外商须于阴历九、十月回国，如届时因货款未清，只能酌留一二名司事者的澳门过冬；外商在广州只能住在行商为之特建的“夷馆”内，其生活、行为由行商负责照管，不得任意外出闲逛，也不许民人出入夷馆。如因购物必须外出，须由行商及通事（翻译）伴随。后因英商提出异议，乾隆末年规定，外商可于每月初二、十八两天由行商派人带领前往海幢寺陈家花园游散，但日落必须回馆。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又改为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次，每次十人，由通事陪同，前往海幢寺花园游散，日落回馆。外国妇女，包括外商或大班的眷属不得在夷馆居住，只许停留船上或寓居澳门；禁止外商坐轿，限制外商雇佣民人看货、守门、担水和挑货，规定“每夷馆一间，……雇看货夫一名，不许额外多用。其人夫责成夷馆买办代雇，买办责成通事保充，通事

责成洋商保充，层递箝制”。“倘夷人额外多雇人夫，及私雇沙文服役，将通事行商一并治罪”^①。

禁止夷船偷运枪炮到夷馆。

夷船停泊之地拨派兵丁加强巡查。

凡夷船到中国之后，不入口纳税，而在外洋寄泊，走私漏税，贩卖鸦片者，“立时驱逐，不准逗留”^②。

以上规定有的在于维持正常中外贸易，保护外商安全及监督其非法行为，这是任何主权国家应有的权利和职责；有的反映了清政府的专制和无知，如禁止外商坐轿是因为坐轿是清官员独享的特权，不准番妇在夷馆居留，目的在于不让外商在广州享受家庭生活，以免其留恋忘返。由于清政府的腐朽无能，而资本主义势力又蓄意捣乱破坏，这些规定往往只是具文，并没有能够真正付诸实现。

清朝闭关政策的主要方面是对国内所实行的一些商业的、文化的政策。具体措施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清初实行“海禁”和“迁界”，断绝中外贸易。顺治十三年（1656年），皇帝下令禁止商民船只下海贸易，违者“不论官民，俱奏闻处斩，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其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缉，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不行举首，皆处死。凡沿海地方口子，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如有疏虞，专汛各官即以军法从事，督抚提镇并议罪”。所以如此严厉，是因为当时“海氛未靖，必有奸民暗通线索，资以粮物。若不立法严禁，何由廓清”^③。换言之，严厉禁海是为了孤立、镇压占据沿海的南明势力，特别是孤立、镇压据有台湾的郑成功势力。顺治十八年（1661年）实行“迁海”，勒令从山东以南到广东沿海地方，一律后撤30到50里，禁区内的房屋全部拆

①② 卢坤《防范夷人章程》，《粤海关志》卷29，第28—36页。

③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一，第3页。